

#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东亚商路及其影响<sup>\*</sup>

费 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中、朝、日三国间的贸易极为活跃,并形成了一条相对稳定的商路,即中国北京—栅门—义州—东莱—对马—日本京都。中国的丝织品、朝鲜的人参、日本的白银是这条商路上的主要流通品。这条商路的存在,对东亚区域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经贸往来无疑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其次,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然而在封贡体制下,经济功能无法完全展现出来,最终导致商路的衰落。

关键词 清代 东亚 商路 影响

作者费驰,1971 年生,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邮编 130024。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东亚地区曾形成了一条稳定而活跃的商路<sup>①</sup>,即中国北京—栅门—义州—东莱—对马—日本京都。这在东亚开港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这条商路的存在,曾对东亚区域产生重要影响,但学界对此时期东亚商路尚关注不多<sup>②</sup>,影响了对东亚区域贸易历史的全面认识。本文试图利用中国、日本及朝鲜史料,从商路的形成、物品的流通状况以及对东亚区域影响等方面入手,对上述问题做一粗浅探讨,请方家匡正。

从康熙朝后期开始,直至营口开港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册封朝贡关系的存在,束缚了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性质与活力。同时,东亚各国国内封建经济体制的封闭性,导致其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采取“闭关”政策。因此,在东亚地区除了出于政治因素及边境居民的实际需要而始终持续进行的宗藩贸易和边境贸易外,一直没有大规模的贸易行为。但

<sup>\*</sup> 本文为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基金项目及第 49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10491308)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所说“东亚商路”,仅指中、朝、日间的商路,不包括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另,论文阐述时段规划在“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是因为这条商路在清代最为稳定和繁忙,即商路上的中、朝、日间的贸易极为活跃,具有典型性,亦具有借鉴性。

② 相关问题的论述,据笔者所见主要有:[日]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商贸易史研究》,创文社 1981 年版;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年版。

出人意料的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东亚地区曾形成了一条稳定而活跃的商路。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这条商路形成和繁华的原因:

首先,东亚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商路形成所需要的政治环境。

在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秩序下,封贡体制是东亚区域一种基本的国际关系形态。学界普遍认为,到了清代,封贡体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备。崇德二年(1637)正月三十日,朝鲜与大清签订了三田渡盟约,标志着大清与朝鲜正式结成宗藩关系。但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后,中朝关系才逐步纳入“天朝礼治体系”框架中,即朝鲜王朝决定在“天朝礼治体系”框架里处理朝一中一日的关系。<sup>①</sup>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止,中朝之间的封贡活动从未间断,是持续而稳定的。对于如何处理朝鲜与日本的关系,清朝对属国朝鲜有明确的规制,即“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至彼也”。<sup>②</sup>于是,在东亚封贡体制下,朝鲜与日本建立“交邻”关系,即在经济上进行贸易往来,同时,向清朝汇报与日本的交往情况。与此同时,虽然日本与清朝之间没有朝贡册封活动,但在国际关系处理上,亦未见破裂的公开言行。因此,经过明末清初的秩序混乱后,康乾时期,笼罩在封贡体制之下的东亚局势处于平稳运行阶段,这种和平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形成持续稳定的国际贸易往来。

其次,物资需求,即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商路形成并长期活跃的动力因素。

由于在国际关系上,逐渐恢复了明清以来的东亚国际秩序,在政治上处于“封贡制度”下的中朝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但壬辰倭乱后,中日长期处于国交断绝的状态,不仅没有使节的往来,而且由于海禁政策的存在,商船的往来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由于日本不在藩属之列,故没有向清朝朝贡以便乘机直接贸易的途径。但由于中国丝织物品品质优良,花纹丰富,在颜色的流行和设计等方面远远超过日本国产丝织品,因此日本国内需要量极高。可是在康熙元年(1662),荷兰失去中日贸易中介地台湾以后,进口到日本的只有东京丝、弁柄丝、波斯丝,同时,康熙二十四年(1685)日本的生丝进口特权,又被细分为白丝、黄丝、下等丝等类,并且同年生丝交易量只被分配为贸易总额的1/3,因此长崎的生丝进口贸易也急剧下降,<sup>③</sup>根本不能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求。于是,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对马藩通过向朝鲜大量出口白银,与朝鲜商人交易贩回中国丝织品的生丝贸易,逐渐繁荣起来。可见,日本需要通过朝鲜的“中介贸易”,来获取所需的丝等中国货物。这样看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供给途径,这条商路对日本具备独特的重要意义。

中、朝、日三国间货物的流通,使商人获利颇丰。由于顺治十五年(1658)后,中国商人不再随使至朝鲜,使行贸易全由朝鲜人为之,且居中日贸易之奇,故其利润颇厚。仅以生(白)丝为例,康熙九年(1670),刚从中国出使回来的大臣闵鼎重说:“我人之贸白丝于清国者,皆入倭馆,则辄得大利。白丝百斤,贸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馆,则价至一百六十金。此大利,故白丝虽

<sup>①</sup> 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页。

<sup>②</sup> 《朝鲜仁祖实录》卷34,仁祖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本。另见《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戊辰条载:“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

<sup>③</sup> 参见[日]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商贸易史研究》,第280页。

累万斤,皆能售之矣。”<sup>①</sup>可见,当时在倭馆卖给日本商人的白丝出口价几乎是进口价的 2.7 倍,而康熙二十三年起,卖与倭馆白丝的价值为每百斤 235 至 250 两,康熙三十七年后更平均至 320 两以上。<sup>②</sup>据 17 世纪末朝鲜的记录“杂物折价”表推算,朝鲜译官以银 3000 两在汉城购入参市往北京,再以出售所获购白丝返回汉城卖出,可获净利 2264.17 两,利润高达 75.47%。如资本系以十二之利贷得,则净利为 1664.17 两,利润达 55.47%,仍非常之高。<sup>③</sup>同样据“杂物折价”表所载,“白丝每一百斤,北为一百二十两,东为一百九十两,南为二百四十两”,<sup>④</sup>即白丝在中国是每 100 斤价值 120 两白银,运到朝鲜国内就提高至 190 两,再转卖到对马则是 240 两。这一方面可以反映中国白丝的流通过程,同时记录了白丝价格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到,朝鲜与对马商人贩运中国白丝的利润是非常高的。如,中国白丝运到对马以后,价格翻了一番。长崎贸易中的生丝买卖,通过进口商、长崎本地商人、各国商人手中转卖,再送到京都等周边市场售卖,故利益亦在这些商人手中分散,市价升高;而对马藩从朝鲜商人手中收购生丝后,不经中介商人之手直接送到京都市场售卖,因此不难想象,对马藩的收益是非常之大的。<sup>⑤</sup>总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这条商路焕发着生机。

最后,国际贸易交流的局限性是商路形成的客观原因。

在此时期,由于远洋航行能力的限制以及视域的闭塞,尤其朝鲜与日本的实力还不强大,交流的范围只能局限于东亚区域,由此决定了物产丰富且以丝等为主的中国市场在区域内尚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促成此条商路存在与繁荣的客观因素。

## 二

中国的丝织品、朝鲜的人参、日本的倭银是这条商路上的主要流通品。

商路上中国丝织品的流通状况。17 世纪前期,长崎贸易的主要商品是生丝,特别是白生丝,但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期,虽然在生丝进口特权之下,中国的丝、缎等物品能够直接到达日本长崎,但主要是通过朝鲜的倭馆贸易流通至日本。即中国商人将产于江浙的生(白)丝等物品运到栅门等地出售给朝鲜商人。义州商人又把它转卖给在东莱倭馆的日本商人,朝鲜与日本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对马商人,贸来物品通过对马再分销至日本国内。同时朝鲜使团译官和商人从北京进口中国的物品,与日本商人进行交易的部分,亦是通过相同的路径。

中国生丝及丝织品在清中期以前是出口朝鲜的主要物品。<sup>⑥</sup>生丝在顺治年间已经销往朝鲜,康熙二年(1663)清廷放宽朝鲜对华商品输出后,中朝贸易量大增。康熙五十一年(1712)

① 《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 22,显宗十一年三月三日。

② 参见 Tashiro Kazui, “Tsushima Han’s Korean Trade, 1684—1710”, *Acta Asiatica*, 30: 100 (1976)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Tokyo.

③ 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 226 页。

④ [朝]苏斗山:《杂物折价》,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研究会编《史学会刊》第 11 期。

⑤ 参见[日]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商贸易史研究》,第 283 页。

⑥ 参见韩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同文汇考》《原编》卷 63,翰进印刷公社 1987 年发行版本,第 10 页。

随赴清使团的朝鲜人金昌业说,“我国所买锦段皆出于郑,其价银多出10万两外”。<sup>①</sup>垄断中朝在北京贸易的郑商,根据朝鲜人的喜好,每年都在苏州、杭州、南京等丝织品产地特别订做匹缎,运赴北京贸与朝鲜译商。但中朝间丝织品贸易的具体数字不详。

日本进口中国的丝织品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贸易,即通过中国船舶来日在长崎进行的丝织品贸易;二为中继贸易,即从釜山倭馆由对马商人转输至日本。由于海禁的存在,清日贸易商品,多经朝鲜进行流通。朝鲜商人从清输入绵丝,转卖给日本商人。又从日输入金、银,售与华商。1700年,日本流入李朝的白银,高达12万两,可见中介贸易规模之巨。<sup>②</sup>

清代对马自朝鲜购生丝首见于顺治九年(1652),达286斤,至乾隆十六年(1751)几已全停。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最为繁盛。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四十六年(1707)间,对马输入黄丝3696斤,白丝1588596斤,共1592292斤。其中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之白丝150678斤,康熙三十三年(1694)之141382斤为高峰。<sup>③</sup>

通过贸易帐本中对马藩的生丝进口量,与半数以上同中国船只直接进行生丝交易的长崎贸易进行比较,长崎贸易量虽然不能清楚看出来,但仅以日本贞享元年(1684)至宝永七年(1710)这个时期的贸易量也可以看出,对马藩的进口量占有绝对优势。比如元禄元年(1688),中国、荷兰两船运来长崎的生丝中,通过生丝进口特权进口的总量是:白丝40920余斤,黄丝是58940余斤,总计99860余斤,与同年对马藩的进口量102119斤相比要少许多。<sup>④</sup>可见,当时日本国内在生丝供给上,对马藩相较于长崎占有进口的中心地位。

但随着日本国内丝产量及质量花色的提高,再加上中国直通长崎船只的增多,通过朝鲜中介贸来生丝的数量大减,因此,这直接影响了18世纪初期以后此条商路的繁荣。

商路上日本倭银的流通状况。对马商人在京都以从朝鲜贸来的丝绸换购用于向朝鲜出口的倭银,船载倭银至对马后,换运银船往釜山倭馆,通过交易流入朝鲜人的手中。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朝鲜对日本白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这是由于在康熙五十年(1711)之前,银是朝鲜向清朝朝贡的贡品,<sup>⑤</sup>同时又是馈赠清朝赴朝使节的礼物,<sup>⑥</sup>更是朝鲜购买中国货物用于付款的主要货币。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禁参输华之后,直至乾隆十年朝鲜允许毛皮杂物输出为止,朝鲜法定出口清朝的物品只银两一种,即除部分走私外,朝鲜自中国的输入品全以现银支付。朝鲜使团每行,包括“皇历及无时赉资官”前赴清国时,均携带大量白银,一次总计“动

① [朝]金昌业:《稼斋燕行日记》卷6,韩国奎章阁藏,第538页。

② 参见《承政院日记》,朝鲜显宗十四年七月五日。

③ 参见[日]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商贸易史研究》,第281页(表Ⅱ—13《白丝输入量》)。

④ 参见[日]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商贸易史研究》,第281—282页。

⑤ 清太宗崇德二年规定,朝鲜向清朝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包括“白银千两”(详见《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戊辰条),康熙五十年免此项贡品(《通文馆志》卷3)。

⑥ 馈赠清朝敕使的银,虽然正副使(2人)从“二千五百五十九两减一千五百五十九两”(合计从5118两减至3118两)(《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九月丙午条),后又减至“正使银五百两,副使银四百两”(合计900两),其余陪同入朝人员(通官、随从等)的馈赠银两亦有不同减小(合计仍在千两以上)(《清世祖实录》卷36,顺治五年正月戊申条),但1636—1722年,清朝赴朝鲜敕使达百次,所需银两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参见[韩]全海宗著、全善姬译:《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逾十万”,甚至“一岁渡江之银,几至五六十万”。<sup>①</sup>当时除少数矿银外,朝鲜的大部分银两是由对日贸易交换而来。对马自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十五六年左右共输各成色银约 8326600 两入朝鲜,合纯银约 6355100 两,其中大部分在康熙朝输入,尤以二十三(1684)至四十六(1707)年间为盛期。<sup>②</sup>在康熙七年(1668),日本幕府下令完全禁止白银出口。此令并未立即或完全阻止白银外流,但是“至 17 世纪末……从长崎出口的白银减少到微乎其微”,同时,田代和生指出,额外的白银经朝鲜流入中国,不过与 17 世纪早期和中叶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相比,此时为数甚少。<sup>③</sup>

在此条商路上,日本出口的白银数量及成色的降低,使得流通不再顺畅,亦大大减少了商人的贸易热情。

商路上朝鲜人参的流通状况。人参作为珍贵的药材,是朝鲜的主要输出品。其价值有诗为证:“龙湾大贾计然术,终岁金绮烂灭窟。最是江州一条筏,换得蟪珠大如栗。”<sup>④</sup>可见,人参贸易能给朝鲜义州等地商人带来巨大利润。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几乎垄断朝鲜人参出口贸易的松商遍布于朝鲜人参产地,“随采尽贸,入送倭国,倭国所出之银货尽归于松商,松商亦为没数持入彼中(清国)而行商”。<sup>⑤</sup>松商甚至已经“尽笼一国之人参,注于倭馆,直走燕市,独擅其利,循环不已,使银参不得通用于国中”。<sup>⑥</sup>

在中朝贸易中,康熙二年(1663)至二十年(1681)间,朝鲜出口品俱为人参。由于人参出口日本获利更多,在人参货源日显不足的情况下,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朝鲜禁参输华而代以银两,但由于走私的存在,实际上是参银并用。朝鲜政府为防止因趋利以致民众盗参及潜商的泛滥,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再次颁布法规,严禁人参出口,对日贸易亦在其中,但实际上从未绝迹,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左右更是解除了对日销参的禁令。

在日朝贸易中,在 17 世纪,对马藩几乎垄断朝日间的人参贸易。<sup>⑦</sup>对马岛自康熙十三年(1674)至六十年(1721)间,平均每年自朝鲜输入人参 1460 余斤,至雍正三年(1725)无数字。<sup>⑧</sup>但由于日本试种人参成功,再加上长崎至中国江浙商路的畅通以及倭馆人参价格较贵等原因,在乾隆后期,人参流通减少。这也是此条商路萧条的原因和表现之一。

乾隆二十三年(1758)朝鲜官员称:“中古则日本不与中国相通,所用燕货皆自我国莱府转卖入去,故一年倭银之出来者殆近三四十万两;雍正年间中国直通倭国之长崎岛,故倭银之出来我国者甚少。”<sup>⑨</sup>

① 《备边司誊录》,朝鲜肃宗十九年四月初五日条。

② 参见[日]田代和生:《十七世纪后期—十八世纪日本白银出口》,社会经济史学会编:《新探寻新的江户时代历史画卷》(1977),第 50—52 页。《德川时代白银与货币现额》,梅村又次编:《日本经济从近世到近代》(1976 年),第 233 页。

③ 参见[日]田代和生:《江户时代的外交关系》,第 295 页(Tashiro Kazui,1982,“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Edo Period: Sakoku Reexamined”,*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8, No. 2: 283—306.)。

④ [朝]金锡胄:《捣椒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东国大学校出版部 2001 年版,卷 24,第 35 页。

⑤ 《备边司誊录》,朝鲜英祖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条。

⑥ 《备边司誊录》,朝鲜英祖元年十月初二日条。

⑦ 参见[日]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商贸易史研究》,第 285 页。

⑧ 参见[日]金村鞆:《人参史》卷 3,京城(汉城)1937 年版,第 253—258 页。

⑨ 《备边司誊录》,朝鲜英祖三十四年正月五日条。

在中日贸易中,日本提供给中国大量白银,而中国给日本提供了奢侈的商品、生丝以及纺织工业技术。由于封贡体制的存在,这需要朝鲜的中介才能实现。因此,日、朝政府实行白银禁止出口政策后,再加上雍正年间中、日直接贸易的展开,商路上失去了重要的流通物品——倭银,连环链条的中断,就使交易中心发生了变化,东亚商路随之出现改变就不可避免了。

### 三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东亚形成的这条商路,对区域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经贸往来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稳定商路的形成利于区域间商品的流转。这从商路上两个核心的国际交易中心——中朝间的栅门后市与日朝间的倭馆贸易中可以清晰的体现出来。在封贡体制下,随着中朝两国贸易的发展,出现了栅门后市,即朝鲜京畿、平壤、安州、开城、义州等地商人,每当使节赴清时,混入驿卒或仆从中间,携带人参或白银,随之渡江,到凤凰城栅门进行贸易。到18世纪,栅门后市几乎成为中朝两国商人贸易的唯一中心地。栅门后市的交易品中,朝方主要有人参、白银、纸张、丝绸、绉布、毛皮等,中国主要有绸缎、白丝、药材、宝石、眼镜、文具等。朝、日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缔结己酉条约后,开始恢复邦交,同时进行贸易往来。在釜山倭馆进行的贸易是朝日间的主要贸易形式,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开贸易,即“每月三旬之三、八日”(若倭人有请或物货委积之时,则别开市),对马与朝鲜商人在彼此官员监督下,在倭馆大厅“各以其货以次交易,尽情论定”,<sup>①</sup>即贸易品、数量及价格无定制,因时而宜。日本输出品主要为银子,其次为铜、锡、胡椒、水牛角、苏木及毛皮糖等,朝鲜输出主要为中国进口之生丝、丝织品及朝鲜人参。<sup>②</sup>二为走私贸易。即在大厅交易后,朝、日商人转入厢房中交易人参,这与中朝边市贸易情形大致相同。另外,对马藩与朝鲜政府之间存在定品定量的交易。前者货物先为铜26000—29000余斤,锡15000多斤,苏木400余斤,水牛角约300桶,后来,锡与水牛角代之以铜或银。朝鲜输出为棉布5万多匹,其中部分曾折为稻米和人参。“中朝贸易以及通过朝鲜的中日贸易在17世纪末也同样繁荣”,“元禄时代(1688—1703年)的日本的显著繁荣与17世纪末中国的繁荣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联”。<sup>③</sup>这种超越国界的互补互利和自愿基础上的区域经济联系的持续存在表明,虽然存在所谓的“闭关锁国”,但东亚三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却从没有间断,这是在地缘环境下经济利益使然的结果。同时,国际贸易促进了凤凰城、义州等边境城市的兴起以及釜山、平壤等城市的发展,是这些城市成为近代商埠的历史基础。

其次,成为文化交流的稳定通道,有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封贡制度”限制了东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方式,特别是在清中前期,使者几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唯一纽带,但限于身份的束缚,真正活跃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是那些没有语言障碍的译官和随团商人以

① 《通文馆志》卷5“交邻”,景仁文化社1945年版,第23页。

② 关于交易品,参见Tashiro Kazui(田代和生),“Tsushima Han's Korean Trad, 1684 - 1710”, *Acta Asiatica*, 30: 85 - 105 (1976)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Tokyo, pp. 88 - 89。

③ 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著、陈兆肆译:《对中国和日本“十七世纪危机”的几点观察》,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wgrkzg/2010-04-19/31459.shtml>。

及文人学者们。朝鲜半岛对中国书籍的购求一向十分重视。在唐宋时期,中国书籍就不断流入朝鲜半岛。尤其是明代,朝鲜王朝前期从明朝购求中国书籍的数量和种类,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朝鲜王朝努力吸收儒家文化,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立国之本、修身处事的原则。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sup>①</sup>明清鼎革之后,尤其康乾时期,朝鲜使臣加大了在中国市场对书籍的购买量。大约从 17 世纪到 18 世纪,清朝的考证学和文艺以及西洋的天文学、历法、地理学、医学、音乐、数学、火器等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通过来华的使者与商人介绍到朝鲜。交流总是相互的。中国历代文人也收录、刊行过不少朝鲜的著作,使它们得以在中国流传。清代中国文人大量搜求朝鲜各种著作并为之作序刊行。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朝鲜的诗,在中国广为传播。汉字文化成为联结东亚区域的坚韧纽带,是这条商路所承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但是在封贡体制下,商路的经济功能无法完全展现出来。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东亚地区各国并没有出现多边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活动。究其原因,一为东亚各国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采取“闭关”政策;二是东亚传统册封朝贡关系的存在,束缚了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性质与活力。在东北亚各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彼此间不可能出现或建立起近代商贸关系。<sup>②</sup>由于在封贡体制下,商路本身固有的经济功能无法展现出来,因此,当日本无需借助朝鲜的中介贸易而直接与中国在长崎、江浙等地通商后,这条只能在中朝宗藩贸易框架内运行的商路便无可挽回的衰落了。

总之,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在东亚封贡秩序下,由中、朝、日彼此需求的丝、银、人参等物品,串结起来而形成乃至繁盛的国际商路,将区域连接成一个整体,促进了区域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但在当时国际环境束缚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当维系商路的物品失去往日的价值,商人们便因利益的缺失而慢下了忙碌的脚步。随着商人们为追逐商品利益而另辟蹊径,这条商路亦便渐失往日的繁华。但它曾经负载的意义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在倡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今天,还有值得借鉴的现实作用。

(本文责任编辑 侯毅)

① 参见刁书仁:《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古代文明》2009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段光达:《东北亚地区各国间近代贸易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史学集刊》2001 年第 2 期。

**Key words:** Ryukyu Diaoyu Island sovereignty ownership international law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Birth Place of Mouzhu Huang Hong( 谋主黄泓) in Murong Wei ( 慕容廆) Period ..... Zhao Hongmei(72)**

By comparing and identifying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Huang Hong in Lujiang( 卢江) and the man who styled Shi Chang( 始长) and Weijun Chiqiu ( 魏郡斥丘) as his hometown are the same one , and the native place of Huang Hong before his coming to Yan was Weijun Chiqiu , which belonged to Sizhou( 司州) . After submitting to Murong Wei , Huang first was Mouzhu , and then Canjunshi( 参军事) .

**Key words:** Murong Wei Mouzhu Huang Hong Weijun Chiqiu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British Policy to Tibet and the Earlier Designment of McMahon Line—Focusing on Williamson Incident in 1911 ..... Liang Junyan(75)**

In 1911 , the Britain adjusted the policy to Tibet from nonintervention to march and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invading China 's southwest frontier , under the excuse of Williamson 's death whe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appened in China. Based on Chinese and English research achievements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ason and purpose of the readjustment systematically , and argues that the investig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British in Abor area and so - called planned new outside line are carefully prepared of the illegal McMahon Line in 1914.

**Key words:** the British policy to Tibet McMahon Line Williamson incident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Irrigation Technology of Uygur to Heilongjiang area in the 39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 Jin Xin(87)**

Based on the analyzing on some Manchu materials of the Archives of the Office of Heilongjiang General(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 the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irrigation technology of Uygur to Heilongjiang area. In the 39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and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nified multinational country 's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and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emperor Kangxi Uygur Heilongjia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The Trade Routes and Its Impact of East Asian at the End of 17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18th Century ..... Fei Chi(95)**

During the late 17th and the early 18th century , the trade among China , Korea and Japan were active , and a relatively stable trade route was formed , that was China Beijing - Zhamen( 柵门) - Yizhou( 义州) - Donglai ( 东莱) - Tsushima( 对马) - Kyoto , Japan. Chinese silk fabrics , Korean ginseng , Japanese silver were the main circulation products. The route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East Asia.

**Key words:** Qing Dynasty the trade route of East Asia influence